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龚书铎 主编

清代 代理 学史

中卷

李帆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龚书铎 主编

清代理学史

中卷

李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理学史. 中/龚书铎主编; 李帆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978-7-5406-6535-7

I. 清… II. ①龚…②李… III. 理学—思想史—清代 IV. 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967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49.5印张 1 080 000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6535-7

总定价: 120.00元 (上卷、中卷、下卷)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34120440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清中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学术的总体走向	
一	倡导文治与厉行禁书并举	2
二	乾隆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	11
三	汉学的兴盛与理学的退潮	17
第二章	宗程、朱的理学家	
一	汉学氛围笼罩下的程朱理学	32
二	理学名臣陈宏谋、朱珪、尹会一	38
三	维护程、朱正统的汪绂、雷铨	69
四	“笃守程、朱”而又兼长汉、宋的翁方纲 ...	89
五	以明道致用为归的许宗彦	98
六	以理学异端名世的谢济世	106
第三章	桐城派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一	古文义法与理学思想合一的桐城派	118
二	姚鼐的理学思想	135
三	阳湖派对理学的态度	150

第四章 几成绝学的陆王心学

- 一 在夹缝中生存 160
- 二 一力维护陆、王的李绂 165
- 三 出入于儒、佛之间的彭绍升 181

第五章 汉学家的义理思想

- 一 汉学家对理学的态度 194
- 二 戴震的义理之学 201
- 三 程瑶田、焦循对戴震义理思想的补充与发展 231
- 四 凌廷堪的“以礼代理”思想 249
- 五 阮元的义理新义 258

第六章 理学与社会文化

- 一 理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及社会应用 290
- 二 程朱理学与清中叶的科举取士 293
- 三 书院教育中的理学 301
- 四 理学与清中叶的文学 310
- 五 民间社会中的理学：以徽州为例 340

第七章 汉宋关系与嘉道之际的学术转换

- 一 清代中期的汉宋关系 352
- 二 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358
- 三 汉学弊端的暴露与理学的走向复兴 385

结语

- 一 清代中期理学的特点 396
- 二 清代中期理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399



第

一

章

清中期的文化政策与 文化学术的总体走向

清代中期，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文化学术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些变化和气象，都对理学在此一时期的命运和走势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一 倡导文治与厉行禁书并举

康熙、雍正和乾隆帝当政时代，向被视作“康乾盛世”，乾隆朝更被视为全盛之朝，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文治武功”均臻极盛。所谓“盛世”，是指当时国家统一，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文化建设也有新的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文治”与“武功”联系紧密，对统治者而言，“得天下”主要靠武功，“治天下”则要以文治为主，而“治天下”之时为多，属社会常态，所以文治的重要性恐高出于武功。清朝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初期的战乱动荡之后，一旦安定下来，便不能再以“马上治天下”了，而是要兴礼乐、立制度、明典章、崇教育，“以文教佐太平”^①。自顺治帝起，统治者把“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倡行文治。乾隆帝更是着力贯彻这一国策，使文治建设全面发展，文治局面基本形成，成绩斐然。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征集整理典籍文献。搜求典籍、编纂图书，是倡导文治最有

^①参见《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清实录》第2册，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效的途径之一，历代莫不如此。乾隆帝继承了历代王朝有为之君及其祖、父聚书、编书的传统，在搜访图书、编纂典籍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收到可观成效。

乾隆六年（1741）和十五年（1750），乾隆帝两次谕令搜访遗书，但效果不显。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征书活动则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开始的搜求典籍。这年正月，乾隆帝颁发上谕，说：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緜，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牘、屏障、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①

从这道谕旨来看，乾隆帝很想通过地方官员的努力，将古往今来天下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图籍（部分不合标准的除外），采集后“汇送京师”，以充内府之藏。征书工作起初并不顺利，地方大员往往推搪，但在乾隆帝几番下诏催促，以及决意开馆辑校《永乐大典》进而编纂《四库全书》的压力下，各地官员不得不谨遵严旨，加意搜访，征书工作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经过数年的征书访书，大量图书包括许多珍本秘籍被集中到朝廷。据档案记载，全国各地共征集图书达 13 000 余种^①。这些图书种类繁多，既有能成就内圣外王之学的经史书籍，又有九流百家之书以及历代至当朝名人诗文集等，可谓包罗万象。

征书而外，就是大规模开展对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项工作康熙朝即已展开，乾隆朝则集其大成，数十年间，官修各种书籍百余种之多。编纂整理的文献涵盖广泛，既有经、史、地理、传记、志书等类，又有典制、职官、律例、政书等类，还有九流百家、诗文等类，如《周易述义》、《钦定蒙古源流》、《满洲源流考》、《御批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满汉名臣传》、《八旗通志》、《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皇朝文献通考》、《历代职官表》、《大清律例》、《日知荟说》、《授时通考》、《御定医宗金鉴》、《历象考成后编》、《唐宋诗醇》、《唐宋文醇》、《词谱》、《曲谱》等等。尤其是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汇集了古代文化遗产，标志着乾隆朝整理典籍的巨大成就。

二是注重教育科举，多方延揽人才。兴学重教，造就人才，是文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于国家稳定、社会繁荣极为有利。早在康熙年间，清统治者便已认识到这一点，康熙帝曾明确指出：“致治之道，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19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①并专作《学校论》予以阐发。乾隆帝继承了先祖之志，更是着意于此。

在学校教育方面，乾隆帝首重学风、士风问题，多次予以训诫申饬，强调：

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为士者当思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②

在倡导端正学风、士风的同时，乾隆帝采取多种措施振兴教育，如免除举贡生员各项杂差，提高国子监及各省教职官员品级并给与全俸，颁发经史书籍于国子监及各直省官学，扩大各地府、州、县学的入学名额，等等^③。仅就扩大学额而言，乾隆年间共增广20次，增广的学额大约在3万名左右^④。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全国各地的官办教育大为完善。此外，乾隆帝还很注重对书院教育的扶持，他曾赐紫阳书院“白鹿遗规”匾额，以示勉励；又曾赐钟山、紫阳、敷文书院《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乾隆三十年（1765），改书院“山长”为“院长”，以示尊礼，又要求院长一职，必择经明行修之士礼聘之。在这些措施的奖掖下，书院渐次兴盛起来。当时的情形，如商衍鎡

①《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四，《清实录》第4册，5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九，《清实录》第10册，243~244页，中华书局，1985。

③参见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27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④李世愉：《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代科举制度考辨》，157~161页，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所言：

是时京师金台，直隶莲池，江苏钟山、紫阳，浙江敷文，江西豫章，湖南岳麓、城南，湖北江汉，福建鳌峰，山东泅源，山西晋阳，河南大梁，陕西关中，甘肃兰山，广东端溪、粤秀，广西秀峰、宣成，四川锦江，云南五华，贵州贵山，奉天沈阳，各省书院以次设立，其余府、州、县或绅士出资，或地方官筹拨经费，置产置田之创立呈报者亦多。^①

可见在全国主要省份，书院教育都发展起来，而且不少人才出自书院，“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②。

与学校教育相联系，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同样是延揽人才、稳固统治的重要手段。清统治者将科举考试的内容规定为《四书》、《五经》，并以程朱理学作为士子解经立说的标准。为了方便士子应考，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如乾隆帝曾下令选录明清诸大家有关《四书》的时文，辑成《钦定四书文》，广为颁发，以为士子科举考试的程式。通过这类举措，乾隆朝廷延揽造就了不少所需之才，为稽古右文、推行文治创造了良好条件。除正常的科举取士外，清廷还通过“制科”，随时取用各类人才。乾隆帝曾开博学鸿词科，并下诏求经明行修之士，取才效果明显。为了方便通经之士的人选，乾隆中叶起还对取士标准有所调整，不仅“穷究性理”，同时也崇尚经术，从而令经术之士能被录取。这样，性理、经术兼重，录取人才方面广

^①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②赵尔巽等：《选举志（一）》，《清史稿》卷一百零六，第12册，3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泛，更有利于文治局面的形成。

上述两个领域的成绩表明乾隆年间的文治建设确有成效，不过这仅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文治的另一侧面则是可怕的文化高压。对于统治者来说，实行文治政策的目的是要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统一人心，强化控制。搜求编纂典籍、多方延揽人才是从正面的角度推行这一方针，而文化高压则为达到文治目的的另一关键手段。具体而言，在乾隆朝，是以厉行禁书和兴文字狱的方式来实施这一高压政策的。

清朝统治者素有防范文人学士的传统，康熙帝虽然为政尚宽，但仍有戴名世之狱。到雍正时，对思想界的控制更趋严厉。乾隆帝承继其父、祖之风，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每每以人心不古、风俗不淳为念，并在其统治的中后期展开全面的整饬行动：查毁禁书的同时屡兴文字狱。

查毁禁书与编纂《四库全书》密切相关。征集天下图书于京师，并以此为基础编纂《四库全书》，本是为标榜文治，“彰稽古右文之盛”。但由征书转为禁书，却非偶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统治者，一向深知久受华夏正统观念浸淫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所抱有的顽强抵制态度。许多汉族士人在清初的武装反抗失败后，仍不肯与清廷合作，而是转而以著书立说的形式进行消极抵抗。这类著述，影响深远，无疑对当局造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所以康、雍之际屡兴禁书与文字狱大案，目标所针对者正是这类著述所表现出的汉族士人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乾隆帝发动征书，也许并非一开始就想“寓禁于征”，他本人也曾表态：

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

涉，必不肯因此加罪。^①

但随着征书活动的展开，大批遗文秘籍被呈送上来，乾隆帝改变了初衷，因他深知有害于统治的书籍不是一种两种，依他的标准，“违碍”之书数不胜数，可各省督抚惧于天威，不敢上呈，这反而促使他下谕禁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当征书尚未结束之际，他颁下谕旨，内中言：

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进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其各省缴到之书，督抚等或见其书有忌讳，撤留不解，亦未可知。或有竟未交一关碍之书，则恐其仍系匿而不献。著传谕该督抚等，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去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②

^①《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13页，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此书由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

^②《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239~2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在这一谕旨严令之下，一场大规模的禁书运动便全面展开了。

从当时禁书的基本情况来看，禁书的范围主要是以下几类著作：一为明代以前人之书，主要查禁书中对少数民族歧视和侮辱的字词语句，如虏、胡、夷狄、犬戎、蕃、酋等，处理方式为摘改数字、数句或整段删除；二为明末清初人所著书及清朝历次文字狱案犯所著书，这是查禁的重点，当然这里也有区别，文字狱案犯之书是要全数销毁的，而对明末清初人之书则要“区别甄别”，“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而像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等“立朝守正、风节凛然”之人所著之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以显示清帝“大公至正之心”^①；三为有碍于伦理道德、政教风化的书籍，如琐语淫词以及此类小说、戏曲等，这点与前朝类似；等等。

在这次大规模的禁书过程中，毁禁的书籍、书版到底有多少，现已很难找到确切的数字，各类统计不一。较近的研究认为“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民间惧祸而自毁者则难以计数^②。这不仅是文化上的巨大损失，它所带来的思想禁锢也深深影响了清王朝此后的文化走向。

禁书与文字狱是相辅相成的。有清一代，文字狱颇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帝即位之初，政尚宽缓，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也不特别严苛，但从中期起，政策急转直下，文字狱频出，数十年间，各类文字狱案不下百余件，成为清廷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最为酷烈的时期。所以如此，即与此时的禁书密切相关。从乾隆四十年到四十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七年（1775—1782），是禁书最为集中的时期，文字狱案也大体以此时为多，这恰说明了两者的关系。往往是每有违碍之书出，便连带着该书的作者（或其后人）、藏者等一同获罪。当时地方督抚“遇有控首逆词之案，不论其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①。而且借朝廷兴文字狱之机，一些人挟嫌告讦，令不少文人学士因之蒙祸，知识界处于动辄得咎的恐怖阴影之中。这样一来，文人学士举手投足之间，不得不谨小慎微，唯恐触犯时忌，招来无妄之灾。如此景况，自然对学术发展十分不利。

作为文治的象征，修《四库全书》本为文化盛举，但与此相关联的却是禁书与兴文字狱。一方面是空前规模的图书编纂所显示的盛景，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和文字冤狱遍布国中的文化浩劫，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反差，却又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修《四库全书》自然是要彰显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而禁书和兴文字狱则基于此时清王朝衰象已露的社会现实，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秘密宗教团体和反清起义一再出现。在此情形下，统治者十分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于是禁书与文字狱就成了武装弹压反抗之外的另一种镇压手段，所针对者为其心目中的异己读书人。也正因如此，文治表象下的两极状况才并存于乾隆朝。

清中期的文治局面主要体现在乾隆朝。乾隆之后，这种局面再没出现过。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已不复有康乾盛世时的繁盛，而是面临着种种危机。实际上，乾隆朝后期，国家已是帑藏困匱，军备不修，吏治败坏，内乱四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嘉庆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乱局，所以他亲政后，在各个方

^①《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零六十九，《清实录》第22册，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面对内政加以整顿。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东来，对外交涉事务愈益成为核心政务之一。内外交困之下，嘉庆帝对文化政策和文化事业的关注远不及乃父，文化政策上几无新举措，只是倡导尊孔，注重礼教；文化事业上也建树不多，主要是循例续修了《大清会典》等书。道光即位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整个局势还不如嘉庆之时，而且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英国侵略者所发动的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失败，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所以，道光帝为政崇实，注重在整饬吏治、理财杜弊、巩固边陲、厉禁鸦片等方面下工夫，而于文化政策、文化事业殊少创获。尽管他自幼即受儒学教育，登基后也提倡宣扬礼教纲常，把儒家放到首要地位，与佛、道等教严格区分开来，“以崇正学”，但文化上仍与其父相似，守成而已，全无其祖乾隆帝的气魄。

二 乾隆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中，康熙帝熟读经书，倡导儒学，尤为尊崇朱熹，推重程朱理学。他曾明确表示：

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①

而且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对于强化既有伦理观念、巩固政权统治最为

^①《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清实录》第6册，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